

## 花潮

## 且任涛声做语声

汤世杰

本报美编 王超 制图

戊戌岁末，梅初绽，花未繁，春消息倒已霁然而至。那天一早拿到的包裹，乃老友张焯铎打苍洱间寄来；打开，见是他的新著散文集《彩云不邀春也来》，扉页间夹着一封手书长信，字迹飘逸密麻，言及数十年间往事，顿觉山水云气扑面，堪可仿老杜吟一声“大理手札适复至，纸长要自三过读”了；另有老照片一幅，说是新近翻拍放大的，一看，乃几个世纪的青涩面孔，睹之令人恍惚而又感慨。一想，哇，原来那时的一点稚拙的欢乐，离我也已如此遥远了么？！

“当年洱海清如碧，且任涛声做语声”……

——看着照片，心里突然就冒出了这两句话。

照片上的4个人，靠着一艘游船甲板栏杆并排而坐，身后是幽蓝清碧云水苍茫的洱海，天空似乎是明亮的，云朵堆垒如絮，轻盈飘忽，又浓凝凝重，让人分明可以觉出那颇有几分潇洒的潇洒。4个年轻男儿，表情虽各自有别，倒都经历过些风吹雨打，即便如今再看，眉额间隐隐透出的青春之气，亦都掩藏不住。中间是雷达和焯铎，黄尧与我则分坐两端。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约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吧，焯铎信中说：“年月无考，但在海上，无疑。”所谓“海”，自是洱海，眼下夜静，虽听不见苍洱浪花，想必那时我们说过的许多热得发烫却发自内心的话语，也尽管叫涛声掩埋，或随山风散尽，但谁又能说，那些话语没深藏在心中呢？那就“且任涛声做语声”吧。

但最终还是想起许多事来。先想起的是雷达，趁着那番兴致，欲给他打个电话，才想起那位实沉多思的西北汉子，已先自往生——通讯发达的今天，天国仍是不通电话的，奈何？只好在心里问上一句：雷达兄，近来还好么？多年前读过他那篇《重读云南》，文中引述一本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的

老地图上的话说：“云南实有倒掣天下之势。何谓倒掣天下？潜行横断低谷可以北达羌陇，东趋湖南而据荆襄可以摇动中原，东北入川则据长江上游，更出栈道直取长安而走晋豫，故天下在其总掣。全国一大动脉之长江，唯云南扼其上游，所为纵横旁出，无不如志，然则云南者，固中国一大要区也。”这番话不知出自哪位老学究之口，真是见解独具啊。”又说：“云南就是这般奇妙：你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不会再找到类似云南的地方了，但你在云南却几乎可以找到外面许多地方和许多历史断层的生态模型，不管是关于气象的、动植物的，还是关于地缘的、风俗的。”还说到他曾登苍山游洱海，如此，那番“重读”后洋洋洒洒的思辨，与那次我们的同游洱海，或就多少有点关联了。其实，一个做评论搞研究的人，云南端的如何，关他何事？他不惟写了，还写得那般情深意浓。那时他怎么想的，我不清楚，记得的惟那次同往大理古城逛扎染街，回后他见到我手里的一件扎染小褂，样式、花色他都喜欢，遂再往古城，回来却说遍寻不见，叫我让给他，加钱都行。看他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暗笑，戏言此物价格不菲，许以3倍原价让出，他竟立马掏钱。一时我差点笑晕了过去：看来你这“雷达”也不灵啊，傻不傻啊？！遂送给他，嘱将愿付的钱留下沽酒，择时再寻一醉。

那么，给黄尧打个电话？此刻，黄尧因亲情故，人正远在北方的风雪之中。行前我通过一次长话，无非是些家长里短人已老去多自保重意思，况不久前得知了他在北京的一些消息，谁知他此刻又在哪里奔波呢？70多岁的人了，早先为云南文事操心，如今为儿女操劳，就算只一声轻轻的问候，到底会叫他伤感还是温馨，我还真说不清了。就罢了。而照片中的那次洱海之旅，正是经他之手策划推出了

一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丛书之后举办的——每一次短聚背后，都隐藏着有心人做人的苦心。

此刻，惟我作为一个外省人，独守着边城这变幻莫测的冬日暖阳。凝望窗外，真当借用友人的半句慨叹，曰：惜青春为美却易逝也，惟江河与岁月留不住！

自然地，更多想到的，还是离我不算太远的焯铎。

黄尧当年主持做的那套丛书里，恰有焯铎的一本。此前，当年那个牧羊苍山俯瞰洱海的少年焯铎，人生际遇中，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而他作为一个抗战中远征滇地的山东汉子的后人，既有山东汉子的那股豪爽，也有他白族母亲胸臆间的一份灵气，即便草鞋赤脚笠帽蓑衣糠菜代饭，性情心倒是直迫云天。毕竟读过几年书，挥动牧羊鞭之余，又哪舍得把青春无偿地交付给晨风落日，虚度此生？人，总得做点什么呢？能超出一般人之上的思索与努力，总会将生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什么都可被夺去，惟心里的梦手里的笔是夺不走的。就那样他写起了小说散文，也写童话，写电影剧本——其实，那每一句每一篇每一部，都关涉亲情、友情、乡情、世情，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也自然都如苍洱间的松风清泉，洱海上的白云苍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读来让人感慨唏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头一次读到他的文字，临别留言，我曾冒失地随手写了两句话：“空中还有无名的星座，请标明自己的方位。”理想主义高扬的年代，谁还没一点雄心呢？其实亦无非一点心情，说说而已。如今回头一看，他还真坐实了那个看似草率的约定。知悉其间他所经历的种种变故与奋发，方知那该是多么的不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年我公出滇西路经大理，事余便想去看望他，跟着他穿过其时尚不繁华的下关城区，愈来愈远，倏忽便已到城

外山脚的一个村子。小门呀呀打开，见是个清寂得落寞而又温馨的白族小院，环顾土墙四合，一株大树葱茏，洒洒下一大片绿荫。“春种绿荫留客扫，秋收红叶待郎归”，料想焯铎每日早出晚归，一应的心思里，都该铺着那片浓荫的。当晚，焯铎的母亲、妻子忙忙碌碌，端上的一桌地道的白族菜肴，浓香扑鼻；酒酣脸热之际，早忘了夜之深浓，索性就在他家正房二楼住了一晚。酒后原该好睡，那夜听着轻拂苍洱的风声，想着焯铎为那一家大人，在日复一日柴米油盐的家常日子里，还能有那些纯情文字，竟翻来覆去地有些无法入眠了……

再去大理，是应焯铎之邀，前往大理陪他邀请来参加大理“三月街”的王蒙。其时王蒙刚从文化部长任上下来，他大约也很难想到，一个他并不熟悉、只是仰慕他那些美好文字的陌生人，会在那时请他前往大理，散散心。看似轻松的谈笑之间，我清醒明白感到的，是周遭不时飘向焯铎的斜斜的目光。许久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他顶着压力究竟有多大。他期待的并非什么奖牌与提携，他用以招待那位他敬重的作家的，无非一个普通读者的心……时代的涛声之喧嚣起伏，常常会掩盖人的真实心声，但人偶尔发出的真实心声里，怎么都不会没有时代的涛声！

再再去大理，是受焯铎之邀，前往出席大理崇圣寺南诏建极大钟复铸竣工大典，其时，焯铎已在大理文化局工作多时。为恢复重建与大理三塔匹配的崇圣寺建极大钟，他四处筹款，朝夕张罗，历尽千辛万苦，终得了此宿愿。当我和晓雪、黄尧一起，撞响大钟，听着那恍惚来自远古的钟声回荡在苍洱之间时，不禁感慨万端——能用文字记录下你的情感与思索，固然美好，但那岂是人生的唯一？不食人间烟火，只一味埋头于文字，说不上能有大出息，人要活成自己，但

并非仅为自己活着。要紧的是，斯世你到底做没做过又做过多少有益于他人的事呢？你有否造福过一方山水？有否摆渡过几个路人？那样的功德，远胜万千文字，是真慈悲。在这个意义上，焯铎的作派，常常让我羞愧。他奉献给苍山洱海，岂止那几本小书呢？而是以他的一生，全力奉献着他的智慧才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理人，他是那个风花雪月之地最合适的手写者。可比起那些倚马万言，拧开水龙头让词语如污水狂泻者，他写得不算多，却都发自肺腑，足够真诚：“纪德不是总说，要怎样才能写得真诚，陶渊明就是最好的回答……陶潜从来就不会想到‘怎样才能写得真诚’”(木心语)；因为他自己就是真诚。

焯铎在信中说，他这本《彩云不邀春也来》，除留了一些送朋友作为纪念，近半数都捐给了大理学院的年轻学子。这么一想，做几篇好文章，出几本好书，虽堪庆贺，却不是为人生添秤加重的唯一砝码，真正的分量，只在他的骨头与魂魄。总活在“自拍”里的人，确是自恋得紧！古今中外蜚声文坛者，有几人是为文学活着的？早先或都有一份职业，有的甚至在某个领域有所创造。细斟，每个“人书俱老”的写作者，都决不是为了体验、搜集写作素材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先得生存、度日，历经万般磨难，尝尽人生百味。待真有感悟，又有一支笔，才开始写作。于他，写作是生命的一种内生性需求。失败的写作者终其一生都不懂这个道理，死写硬写，钻营乞求，即便赢得一点薄幸，又何足道哉？说到底，他得之于天地父母的整个生命，却是失败的——这一点，焯铎比我更懂，更明白。如此，即便当年洱海清如碧，且任涛声做语声，未必就不是更好的选择吧？

嘱告焯铎兄，那书、手札和照片，我都已收好。

## 我与孙髯翁是“乡邻”

南 山

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总是太匆匆……

1967年，母亲就是在现在弥勒的花园宾馆后面，原来的孙髯翁坟前生下我的。据说那一天风和日丽，母亲就在那片干地拔菜籽，而菜籽又分油菜籽和旱菜籽，油菜籽自然用来榨油，旱菜籽就是用来喂秧田的，母亲拔的旱菜籽，就是开白花的那种，刚长成时叫做萝卜菜，长大了就成了农家肥。母亲那一天挺着肚子，中午的时候肚子开始疼，未来得及去医院，就在髯翁坟的庇护下生下了我。

1970年，我3岁，初有记忆。母亲就领着我在那片地周围干农活，对髯翁坟的熟知就像对自己手指头的熟悉。那时候我被母亲抱在高高的髯翁坟堆上，那时候髯翁坟又高又大又圆，没有墓碑，周围用黄沙抹过的坟墙长满青苔，我们村就在那里，坟群相连的空地种着庄稼，周围自然就成了有名的鸡枞窝，每年包谷成熟的时候，这里就云集着老老少少捡鸡枞的人群，记忆中好像这块土地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当然我也无例外，成为这块风水宝地的受益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建起了髯翁公园，记得当时的圆门洞上描有这副对联：“古家城西留傲骨，名士滇南有布衣”。传说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岁(1907)，弥勒士子协力筹资为先生修墓立碑所留，青砖铺成的走廊上塑有髯翁的雕像，山羊胡子微翘，一身布衣，两眼炯炯有神而又满含着沧桑。

再后来这儿建起了酒店，文化馆搬迁。本地企业家周光福保持了髯翁公园原有的外貌并加以修复，免费继续造福着热爱孙髯翁的弥勒人民。

再后来髯翁墓搬迁，我内心“咯噔”一下，当时任弥勒县文管所的葛永才先生洒泪长啸：髯翁，归去来兮，其情景让我抛泪。

再后来的再后来，髯翁墓几度迁移，所幸最后被搬迁到了玉皇阁，那还是我故乡的山体，又得以和我们这些乡亲长相厮守，折腾来折腾去，我们还是终究要在一起。

孙髯翁这个出生在乾隆年间的陕西籍诗人，因为不满当年的科举搜身而掉头就走，从此不问科举，终生为民。之后沉醉山水中，随父寓居昆明，年后后从于弥勒，附近的梅花温泉就是因为孙髯翁常年在此泡池时因喜爱梅花而得名，“万树梅花一布衣”，是他当年的写照。

在弥勒度过了凄苦的晚年光阴，据前些年我尚在人世的大妈说，髯翁一生和我们家交往过密，和我的祖上常在一起聊天叙地，晚年祖上曾多次接济于他，有时是一升包谷，数十斤红薯，但先生从不收受银钱。先生一生甘于淡泊，他的弟子徒孙中有高中回乡探亲探视的，都被他婉言谢绝。髯翁忧国忧民，曾溯流而上，考察金沙江，提出“引金济滇”的设计，后又考察盘龙江，写成《盘龙江水利图说》，晚年目睹官吏榨取民财，百姓流离失所，隐居于弥勒后，被本村乡绅苗雨亭士子聘为西席，门生满天下。仙逝后葬于我的胞衣之地——弥勒城西新瓦房村。

记得我6岁读书那年，母亲牵着我的手，要我拿着三炷香在髯翁坟前下跪，母亲口中念念有词：孙圣人你要保佑这孩子好好读书，长大有出息……

现如今，父母都和孙髯翁一样作古了。我有幸出生在新瓦房村，有幸和孙先生做邻居，我给我的这个乡亲磕过头、烧过香，读过他的诗文，受教于他。他就是我永世的先生。

“文明千秋”，这是髯翁公园唯一幸存的一座牌坊，作为当年髯翁公园幸存的证据，但愿它不要再消亡……

## 扎染的周城

李智红

走进周城，就走进了大理的“白族第一村”。这个古朴秀雅的村庄，是原文化部命名的民族扎染艺术之乡”。

在大理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古老的传统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旖旎的自然风光，孕育了一朵瑰丽的民族艺术奇葩，这就是在大理代代相传的民族民间传统工艺——扎染。

白族聚居的大理洱海地区，是云南纺织文化的摇篮地之一，在东汉时期已形成完整系统的染织法。据《新唐书·南蛮列传》记载，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舞队到长安献艺，所穿舞衣“裙襦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草”光彩照人，即为扎染而成。

扎染，古称绞缬，民间称为疙瘩花布、疙瘩花，是大理地区一门最为古老的民间工艺，已经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沿袭了千年。在云南的大理，白族扎染技艺久负盛名，历史悠久，尤其是在周城，下至三五岁的孩童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几乎人人会扎花，户户能扎染。

周城村的扎染大约始于明末清初，应该是从四川传来的，历经了300多年的发展。到1912年左右，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全村除种田外，兼营同一种手工活计，有的村专营棉花，有的村专门纺布，有的村专门染布，有的村从事裁缝，还有的村制作木纺车。在这个时期，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活络精细，因此脱颖而出成为远近闻名的染染村。

周城的白族扎染远近闻名，或许得益于著名的蝴蝶泉水的浸漂，周城扎染色泽纯正，色光柔和，手感厚实柔软；或许是出自白族金花的慧心巧手，每一件作品都千姿百态，

妙趣天成，溢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因而，首批便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段银开生于白族扎染世家，从小就跟随父母从事扎染工艺。1985年，10岁的她便学会了扎花，17岁起专门从事扎染成品加工，目前从事扎染已经30多年。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段银开在继承传统白族扎染工艺的同时，不断创新，新创了多种扎染花色，丰富了扎染产品的种类。多年来，段银开还积极致力于扎染工艺的传承，教出了一大批徒弟，努力将扎染工艺发扬光大，成为周城新一代扎染工艺大师。

段家的扎染工艺，传承到段银开这里，已是第18代了。在她的巧手中，白布成了艺术品，寄托着白族人民对自然和美好生活的期盼。如今段银开22岁的儿子和8岁的小女儿，也继承了扎染这项技艺。最令段银开夫婿骄傲的，当属自家的精品展厅，每当游客问价，段银开都只是笑笑，“这些是非卖品”。其间，一幅扎染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它一反传统的蓝白相间，呈金黄色渐变晕染，而不是规则的对称花纹。上面展示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敦煌飞天像。也是在介绍这幅荣获云南工美杯金奖的作品《飞天》时，腼腆的段银开口才多了起来。

每一块扎染布，经过了那么多温暖的手，才会变得如此的温情而美好。

在大理，在周城，我看到有许多久远的故事，在一匹匹素朴的老棉布上慢慢鲜活，从细细密密的针脚之间悄悄鲜亮，飘逸着淡淡的清香。一代代，一年年，随光阴的流逝，古老的扎染技艺已经慢慢印染成苍洱大地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和乡愁记忆。

我喜欢厚朴花开时干净雪白的样子，喜欢闻厚朴花散发出的清香味。……淡淡的乡愁，浓浓的情怀，我始终眷顾着故乡土地上厚朴花开时的那些事。花的样子、花的味道见证着故乡的变迁，折射出故乡人的平凡生活，甚至是——云岭大地、祖国大地广袤农村的变迁、普通百姓的生活。

我出生在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新华乡澜沧江畔的一个偏僻山村，贫瘠的故土长不出苗壮的庄稼，即便是再多的土地，多么地精耕细作也无法靠耕种粮食脱贫致富。然而，庄稼“水土不服”并不意味着所有置身这片土地上的绿色生命都会在成长路上戛然而止。比如厚朴树、核桃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家附近的山谷间、田边地头，随处可见生长着苍翠茂盛的厚朴树，那时，不知道它的学名，村民们叫它“小马花”，春末夏初，花香弥漫着山谷。

厚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常青乔木，花蕾和树皮有理气、化湿的功效，特别是花蕾，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材。每到花开时节，父母总吩咐我们姊妹几个去摘花蕾，说是可以卖钱。我们各背一只小篮子来到地边摘厚朴花蕾，爬上树后骑在有着韧性的树枝上快乐摆荡，左一个右一个，把花蕾尽往包谷地里扔，等爬下树再捡。若看见火热绽放的花朵便小心翼翼地拿着，要把它插在空酒瓶或饮料瓶里，装点屋子。花蕾运回家后，得把它一切两半，再用热水烫过后晾晒，直到不含一丝水分。到了赶集天，母亲背上用

## 又见厚朴花开

双春天

蛇皮袋装好的干花蕾拿到山街上去卖，挨近的大理的小商贩则以每公斤四五元的价格把蛇皮袋抖得一干二净。苦等到傍晚母亲赶集回来，背上的篾篮子就有了肉和豆腐，这让热灶上的锅有了飘香的味道。

那个20年前的故乡，村民虽然只能靠传统耕种来讨生活，但日子悠闲自在。春耕时节，清脆的吆牛曲响彻静谧的山沟，劳作的人们闲坐在厚朴树下乘凉，牛羊蹲在厚朴山谷里懒洋洋觅食，房前屋后，水灵灵的梅子、杨梅、桃子、梨挂满枝头，眼瞅随处可见。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煦了这个不起眼的山小山村之后，活跃的核桃市场开启了村民用智慧脱贫的钥匙。故乡的土地本就以核桃的生长而存在，故乡的人本就以核桃的成长而劳作。为了“金”树的成长，只要是它的根茎所触伸到的地方，就没有其他树存在的可能，疯狂的长势所向披靡。就是在那个时候，锋利的斧子划破了静美的厚朴山谷，葱葱郁郁的常青树没了，沁人心脾的花香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幼小的核桃树苗。入冬，落了叶的核桃

树干骨嶙峋，寂寞凋零的山谷失去生机——唯有那幸存下的几株厚朴，“树影婆娑叶如剪”。

故乡的人，我的父亲，那么钟情于核桃，是它改变了故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告别了住草坯房、吃包谷饭，运输靠人背马驮的历史，对我来说，更是雪中送炭让我有机会走出大山。

近10年来，我只顾折腾于融入城市，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有关于故乡的事，耳濡目染最多的莫过于“道路拓宽了、房子变靓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直到今年放假回家，当我走进曾经充满快乐童年的厚朴山谷，眼前的美景把我惊呆了，攀援在厚朴树上的野生金银花金黄色的花朵和洁白如雪的厚朴花竞相开放，蜂蝶起舞欢歌，花香沁人心脾，或喜悦或感慨，打从心底油然而生。原来，唯有核桃树“独尊”的那个时候，父亲并没有对厚朴树斩草除根，经过多年的风雨洗礼，顽强的生命得以重新焕发生机。当我设想要把如此静美的厚朴山谷作为一个重要元素加以保护，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美丽乡村时，父亲的目光让我看到了希望。其实，我的父亲，故乡的人，也喜欢常青、花香的厚朴。

这些年来，他们不仅尝到发展核桃产业带来的甜头，也渐渐懂得巧妙利用资源优势、合理开发大自然才是过上和谐美好生活的捷径。

遥望今天的故乡，耕地里皆是硕果累累的“摇钱树”，周围的山谷则布满郁郁花香的风景林，房前屋后又有花果点缀着，一切都如此自然、美丽。

